

《蝴蝶君》的性别、种族和叙事伦理

Ethics of Gender, Race and Narrative in *M. Butterfly*

董晓烨 (Dong Xiaoye)

内容摘要: 美国主流话语建构性别伦理、种族伦理和叙事伦理, 服务于其政治和文化霸权统治。《蝴蝶君》观照华人身份焦虑, 为华裔男性气质辩护。不同于美国主流话语塑造的华人男性刻板形象, 主人公宋丽玲主动进行性别操演, 打破善恶二元对立, 表现出华人男性气质的多维性和复杂性。通过戏仿性别和种族逻格斯中心主义, 黄哲伦揭露了主流社会霸权, 颠覆了东方主义的叙事伦理, 表现了华裔美国作家的责任担当和价值立场。但是, 在种族伦理语境中, 叙事伦理的呈现异常复杂。宋丽玲的变装行为引发了伦理争议, 这说明伦理语境产生创作局限性, 也影响文本接受。

关键词: 黄哲伦; 《蝴蝶君》; 性别伦理; 种族伦理; 叙事伦理

作者简介: 董晓烨,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亚裔美国文学、叙事学、文学伦理学等。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华裔美国文学的儒释道叙事研究”【项目批号: 21WWD271】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s of Gender, Race and Narrative in *M. Butterfly*

Abstract: American mainstream discourse constructs gender ethics, racial ethics and narrative ethics to serve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egemony. *M. Butterfly* observes the anx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and defends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y. Different from the stereotyped images of Chinese males created by mainstream American discourse, the protagonist Song Liling intended to perform her gender identity, break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showing the multidimension and complexity of Chinese masculinity. Parodying gender and racial logocentrism, David Henry Hwang exposed the hegemony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subverted the narrative ethics of Orientalism and presented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standpoint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ethnic ethics, the realization of narrative ethics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Song's cross-dressing behavior aroused ethical controversy, which shows that ethical context produces limitations in narrative and also affec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text.

Keywords: 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 gender ethics; racial ethics; narrative ethics

Author: Dong Xiaoy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narratology and literary ethics (Email: charlottexiaoye@sina.com).

黄哲伦 (David Henry Hwang) 的《蝴蝶君》 (*M. Butterfly*, 1986) 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华裔美国作品。这部作品获得了西方主流文学界的认可。黄哲伦借此被誉为“美国当前最具有原创性、革命性、想象力和才华的剧作家” (Oliver 72)。但是, 这部剧也因为将华人男子表现为“缺少男人味的, 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群体” (Chin xiii) 而引起诟病。文本引发的伦理争议对华裔美国文学来说极具代表性。一切文学文本都是伦理建构, 具有伦理意义, 而《蝴蝶君》的伦理色彩尤其浓重, 其主要的戏剧冲突来自性别伦理和种族伦理身份的错位。法国外交官迦利马爱上了京剧演员宋丽玲, 两人纠缠半生, 而宋丽玲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男性间谍, 真相被揭露之后, 迦利马绝望自杀。自首演以来, 有关这部剧的争论从未停止。评论家从种族、性别、后殖民、解构和东方主义等视角对作品进行多方探讨, 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迦利马, 对宋丽玲的关注不多, 这说明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是从西方立场出发, 从中国读者的视角和当下中国的伦理现场出发的评论阙如。

鉴于华裔美国文学对中国国际形象传播的作用, 中国学者有必要考察其伦理意义的时代演变。多维伦理关系构造了文本的伦理张力。迦利马陷入伦理危机, 性别伦理身份和种族伦理身份都被颠覆, 产生伦理认知混乱。对于迦利马来说, 宋丽玲是伦理危机的制造者。宋丽玲身处国家贫弱, 华人男性气质被抹杀的伦理语境, 却主动进行性别操演, 解构了主流语境的性别伦理规约, 同时表现出较强的种族伦理意识。异装、同性恋、间谍等伦理事件制造了强烈的伦理震荡和伦理冲击, 引发读者对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的思考。种族伦理同时制造了受害者和施暴者的伦理悲剧。种族伦理充斥着性别隐喻, 衍生出了性别伦理。作为华人男性, 宋丽玲在东西方交往中扮演阴性角色, 这使作者的政治伦理观、叙事主旨、叙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饱受争议。读者和评论家争论作家的叙事用意是质疑还是维护西方社会的伦理秩序? 作者的叙事目的是否实现? 作者是否有意引导读者进行文本误读? 本文研究西方主流话语质询的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规约, 探索华裔作家的叙事伦理, 试图回答: 华裔文本为何会引起巨大的伦理争议?

一、种族语境中的性别伦理建构

文学传达伦理观念, 对文本的正确解读需要返回到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美国社会的伦理语境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在种族伦理维度中, 西方对东方进行话语控制, 将东方塑造成性别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东方主义话语体制

建构二元论的种族伦理结构：西方代表富有、先进、强大和理性；东方被质询为贫穷、落后、软弱和神秘的他者形象。西方话语通过程式化的伦理宣传，建构东方主义的政治伦理和权力体系，以此巩固主流话语的伦理传统。种族问题由多种因素合力引发，与性别的关系尤为密切。种族伦理中包含性别隐喻。东方主义伦理思维化身为性别伦理叙事，转喻为《蝴蝶夫人》这样的浪漫传奇，通过讲述东方女性臣服于西方男性的感伤主义类型叙事，建构东西方的性别伦理结构，以此辅助种族优越论的宣传，维护东西方交往的性政治，这成为西方话语的叙事伦理。

因为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和社会关系的正义性发生错位，所以政治功利主义塑造了畸形的价值观，文化帝国主义设置了伦理对立，引发了伦理失序。在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衰落，政治混乱，军事能力疲弱。美国主流文化将华人塑造为他者，强行施加否定的道德判断。西奥多·罗斯福宣称“中国人不具备坚强、进取、勤奋和冒险等品质（……）中国不适应战争，而且贪图安逸，现在远远落后于具有雄性冒险特征的国家”（Roosevelt 319-322）。在上述伦理语境中，国家关系的伦理隐喻强化和渲染了中国的负面国际形象，美国主流文学中随之涌现出大量的华人刻板形象。否定性判断建立了两极伦理评价，塑造了华人的消极形象，其目的是烘托富有、强大、英俊的白人男性形象。发挥伦理隐喻功能的华人形象呈现扁平人物特征。扁平人物表现“单一观念（……）缺乏深度，容易预测、分辨和记忆，通常会表现出类型化、喜剧化和讽刺性的特征”（Forster 47）。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表现为两种相反的伦理判断，即“种族主义之恨”和“种族主义之爱”，前者反映的是种族威胁，后者反映的是种族阉割。来自主流社会的两种伦理认知体现了主流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塑造了替罪羊的虚假形象，还含混地反射出某种隐喻策略”（Bhabha 68）。族裔刻板形象是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本质主义臆断，体现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东方主义的猜想，帮助美国主流社会排斥华人群体。

上述伦理判断的出现是伦理语境的产物。19世纪中叶，美国主流社会充斥着“黄祸论”的论调。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中国移民吃苦耐劳、坚毅隐忍，这使他们能够适应艰苦的西部环境，但是华人移民人数的增加让统治者心生警惕。为了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固、宗教和文化的纯洁，西方主流话语将华人质询为伦理他者，塑造了傅满洲这个“体现了东方形象的残酷和狡猾”（Wu 165）的恶的化身。傅满洲系列作品将妖魔化的东方形象深植入西方读者的脑海。性别伦理形象随着种族语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为了缓和种族问题，美国政府开始对华人采取安抚政策，随之出现的是“种族主义之爱”的化身陈查理这一文学形象。陈查理被塑造成“模范少数族裔”，是主流社会种族伦理秩序和性别伦理秩序的维护者。他能力出众，但心甘情愿臣服于西方体制；他缺乏男性魅力，对西方的父权制统治不构成威胁。

在发挥伦理宣传功能的同时，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形象的文学价值被削弱。在中美对抗的伦理语境之下，美国主流媒体塑造中国人物的负面伦理形象，目的是引发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伦理抵制，助力和宣传西方霸权。“他者话语的强制建构就是华裔美国人所面对的‘性别奥秘’和社会规约”（董晓烨 63）。华人男性的形象被塑造为伦理的隐喻——傅满洲的性变态和陈查理的女人气——一方面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反感和厌恶，一方面阉割了华人男性气质。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之中，华裔男性被强制赋予从属型男性气质特征，追求，却无法获得白人男性的竞争力和领导力，这种权力话语最终形成了华裔文学创作的伦理困惑和伦理结，也直指《蝴蝶君》中的人物所面对的核心伦理困境。种族伦理规约引发了性别伦理想象。对迦利马来说，有关西方和东方的征服与臣服的浪漫传奇是个“古老的故事（……）他们（东方）的女人害怕我们，他们的男人恨我们”（Hwang 40）。“东方在骨子里想要被支配”（Hwang 129）。秉持着这种“国际强奸思想”（Hwang 128）和“‘黄热病’，即白种男人对于异国情调的东方女性的迷恋”（黄哲伦 152），伽利马将宋丽玲当做物恋的对象，将其植入东方主义式的群体幻想。对种族伦理的错误认知引发了迦利马的悲剧。他浸润于这种危险而具有毁灭性的知识体系之中，深信“即使我们不英俊、不勇敢，没有权力，但是 we 和平克顿一样，毫无缘由地相信我们都应该拥有一只蝴蝶”（Hwang 16）。秉持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偏见，伽利马将中国男性误认为风情万种的东方女子。伽利马的一厢情愿和执迷不悔表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无知和麻木不仁。处在文化偏见和盲视的状态中，伽利马眼中的宋丽玲融合了柔弱、顺从如莲花，邪恶、魅惑如龙女，¹ 阴险如傅满洲，女性化如陈查理等各类刻板人物形象特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伽利马对东方文化的“黄色迷恋”不但没有突显他的霸权型男性气质，反而将他去势为同性恋的“米皇后”（rice queen），即喜好亚洲男性的白人男性。因此，宋丽玲对伽利马的背叛之所以对他造成了致命打击，主要是因为颠覆了后者在性别伦理和种族伦理架构中的优势地位。

宋丽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华人形象。他的出现“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主流媒体中的华人刻板形象的坚冰”（董晓烨 64）。《蝴蝶君》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具有历史人物的原型。宋丽玲主动进行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身份的操演，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把握了一定的主动权，表现出主体性。冷战中的间谍活动和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隐藏等伦理实践既是文本的叙事空白，也是文本留下的伦理谜团。通过赋予宋丽玲一定的主体性、复杂性和深刻性，黄哲伦反驳了主流媒体中的刻板中国形象，打破了原本的种族伦理平衡。

1 1921年上映的电影《莲花》（*Lotus Blossom*）将同名女主人公塑造为柔美、顺从，甘愿为西方男性牺牲的，代表“种族主义之爱”的刻板形象。“龙女”是傅满洲的助手，妖冶、性感、奸诈、神秘，是“种族主义之恨”的化身。

二、华人男性的种族和性别伦理实践

宋丽玲这一人物的出现触及西方话语的伦理禁忌。他引发的最大的伦理争议在于他的性别操演。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性别身份是操演和文化建构的结果。权威话语设立界限，命名、规范和质询个体身份。通过被动地模仿和操演被反复质询的身份，主体无意识地将自身塑造为权力话语的客体。性别身份融合了多元文化建构，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反复复制和演绎，最终成为权力生产的帮凶。同样，“种族也可以被操演”（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275）。主流话语建构种族伦理规约，实现权力的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宋丽玲是固有伦理秩序的破坏者，他错位的性别伦理身份超出了生理学意义上的阿尼玛特征，¹改变了叙事伦理中的客体化形式，占据了优势的主导地位。他的种族身份影响了他的性别伦理选择。他触犯伦理禁忌，解构伦理密码，最终在充满敌意的伦理语境中，主动进行反伦理的性别操演，塑造出了具有主动性、流动性、颠覆性和多样性的华人男性形象。这种“流动性、颠覆性和多样性”（Butler, *Undoing Gender* 34）特征，就是巴特勒所说的“性别麻烦”。宋丽玲男扮女装这一伦理事件，质疑了种族伦理的合理性，揭露了东方主义政治伦理环境的荒谬。受到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霸权的蒙蔽，伽利马一厢情愿地“与一种幻想的模式坠入了爱河”（147），即使偶有疑惑，也将其解读为东方女性的羞怯，这种毁灭性的伦理认知最终发展成难以调和的伦理悖论。

宋丽玲揭露了性别形象背后的种族伦理内涵。“后天的性别经验有可能会自然性别内涵的重组”（Butler, *Gender Trouble* 337）。性别伦理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和一系列的质询和操演的进程中持续的和反复的建构。宋丽玲的性别操演体现出极强的颠覆性，解构了性别和文化霸权。在种族主义语境下，“自然性别内涵”在“后天性别经验”的质询之下被戏仿。种族伦理身份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可以外化的展演。宋丽玲反复对自身的性别伦理身份和种族伦理身份进行仪式性的文化生产，这只是主流话语的伦理幻想。他利用京剧、茶道、长发、中式服装等种族文化符号操演自身的性别伦理身份，为伽利马塑造出符合其刻板形象的性别和种族伦理身份。种族伦理身份的边缘化和无权化也是相对的。宋丽玲扰乱西方伦理秩序，重构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在他的操演之下，他者获得主体性，最终在东方主义的叙事伦理中夺取了主导地位，实现了华人男性的政治现身，由向西方献祭的“蝴蝶”变成了西方伦理体制的破坏者“蝴蝶君”。因为认识到了性别政治的压迫实质，宋丽玲为伽利马构建了一个后者向往的东西方交往的浪漫传奇的幻影。“变装具有抗议功能”

1 荣格提出人格具有异性倾向原型。“阿尼玛”，即男性内心的女性原型，“阿尼姆斯”与之相反。“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表示人的内在特征，与表示外在表现的“人格面具”相对。

(Doane 25)。在文化失衡的语境下，宋丽玲利用自己被定义的缺失，通过有意识的变装秀操演族裔标记，以模仿东方文化的方式来操演性别和操控文化失衡的境地。宋丽玲放大和重复政治规范，夸大欧洲殖民机制的权力，诱导殖民者夸大被殖民者的恐惧、羞耻和臣服。

对性别和种族伦理身份的戏仿也颠覆了东方主义的叙事伦理，赋予宋丽玲圆形人物特征。詹姆斯·费伦 (James Phelan) 提出三维度人物观，即文学人物具有模仿性、主题性和综合性特征。比照这一标准，宋丽玲的人物形象比以往的华人男性形象更加丰满和复杂。华人男性对西方社会的权力质询并非无知无觉，也并非逆来顺受。宋丽玲的顺服是他运用权力的工具。在宋丽玲进行性别操演的过程当中，他原本的性征发生裂变，成为雌雄莫辨的角色。人物的复杂性加强了人物的模仿性，人物的模仿性与故事主题结合，深刻表现了种族主义的话题。由此，语境和叙事进程赋予人物“主题性功能”，人物的静态模仿性特征转变成动态模仿性特征 (Phelan)¹。而多维的人物层次引发了读者的关注和思考，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叙事人物的召唤功能。

圆形人物的出现是华裔美国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表明了华裔作家追求创作的可见性和主体性的努力。通过塑造宋丽玲这一圆形人物形象，黄哲伦揭露了种族伦理的压迫本质。宋丽玲的性别操演实践有力地驳斥了长久以来存在于主流媒体中的华人刻板形象，说明东方人远比西方人所认为的更加主动、复杂和富于变化。宋丽玲的例子表明，华人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并非是本质的和本质主义的，而是多元的文化建构和在特定政治话语质询下的表演。它既是主流媒体进行霸权文化统治和质询的政治手段，也是他者反抗性别和种族霸权的武器。宋丽玲这一华人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话语模式和种族伦理结构，促使东西方交往的浪漫传奇发生权力转移，证明华人在东西方交往中有可能成为强势方。

三、作者的叙事伦理

叙事具有伦理意味，阅读严肃的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重塑伦理和认知图式，进而提高认知的准确性和伦理意识。《蝴蝶君》是对《蝴蝶夫人》这一东方主义浪漫传奇的戏仿和解构。“贯穿黄哲伦的戏剧创作核心的是在存在层次上对个体和文化身份的沉思” (Campbell 105)。在华人男性形象被歪曲的语境之中，黄哲伦履行华裔作家的责任，将复杂的华人男性形象带入大众视野，“将同性恋男子通过东方主义者的幻想建构性别身份的过程戏剧化” (Shin 188)。黄哲伦以变装等违背伦理的情感作为叙事聚焦，引发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冲击，促使读者思考深层意识形态诱因。极端的伦理事例说明，在种族伦理失范的环境之中，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误现荒谬至极。黄哲伦

1 See James Phelan,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9, 243-244.

拷问西方主流话语中的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规约，体现出了作家反政治强权的叙事伦理立场。

黄哲伦将这一极端的伦理事件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不是割裂的场景之中，这说明作者力图表现历史中的个人命运，而不是简单的猎奇。戏剧充分前景化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事件，如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女权主义运动和法国学生运动等。政治和文化因素提升了剧作的政治色彩。另外，故事时间也是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和文化意识觉醒的历史时间。《蝴蝶君》的出现既是种族意识觉醒的产物，也表现和证明了华裔社会地位的提升。因此，无论从故事环境还是话语环境来看，黄哲伦的创作都属于亚裔美国作家挑战主流话语，质疑族裔语境的伦理规约，置换和彰显自身的伦理价值的一部分。

黄哲伦不但指出少数族裔所承受的文化霸权之苦，还指出东方主义给当权者带来的伦理反噬。伽利马对宋丽玲在种族、文化和性别上的虚假认知与现实形成了错位。对自身和他者的错误的身份认知将会引发恶果。伽利马的失势不但具有个体的偶然性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黄哲伦戏剧化地展示了西方男性的困境。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伽利马对权力的渴望根深蒂固。当他在叔叔的柜子里，“第一次发现色情杂志的时候（……）身体哆嗦了起来。不是因为性欲——而是因为权力”（17）。对少年伽利马来说，权力欲表征为性欲。伽利马试图占有和操控女性身体和情感，以此来彰显自己的霸权型男性气质。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在与女性交往时，伽利马欲望受挫，传统观念上的霸权型男性气质遭到阉割。《蝴蝶君》是女权高涨的时代缩影，西方女性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之下，变得独立、自信、沉着。伽利马的初恋、妻子和情人或拥有高贵的家庭背景，或具有强悍的个性。在获得赋权的女性面前，伽利马丧失了主导权，遂将权力欲望投射在仍具有前女性主义特征的亚洲女性身上，将东方女性幻想为理想的欲望对象，抵制和补偿他的权力颓势，满足长期被压抑的男性意识和西方优越感。因此，与宋丽玲相比，他才是那个对东西方浪漫传奇怀有执念的“蝴蝶”。通过中国间谍乔装女性，欺骗其情人 20 年而未被发现这个极端的事例，黄哲伦揭露了文化霸权的荒谬和危害。一方面，权力并非沿着单向的轨道运行，而是双向度的操作。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心理、身份、权力可能会发生相互转换。另一方面，文化优越论使映射在西方眼中的东方形象过度平面化和简单化，因此形成文化偏见，混淆了交往双方对彼此的清晰和正确的认知。

文本的叙事方式同样具有伦理意义。黄哲伦的叙事结构有效地表达了他的叙事内容和叙事目的。黄哲伦是一位具有政治和创作自觉的作家，“一直致力于借用亚洲尤其是京剧的戏剧形式来向西方观众展现美国主题”（Cooperman 366）。《蝴蝶君》糅合了东西方的戏剧创作元素。作家借此追溯和呈现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实现解构东方主义的叙事目的，强调文化对等交往。回忆剧、戏中戏等西方戏剧的叙事结构融合了具有东方元素的服装

造型、背景音乐和角色形象，成为表现政治与文化隐喻的叙事载体。双层的舞台结构更是有力地指向戏剧冲突，暗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以及个人的迷惘和选择。

伦理语境对创作和接受都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作家试图颠覆西方的主流话语，但读者难免对文本进行误读和误判。作者复杂的伦理立场和文本多重的伦理意义也引发了多维的伦理解读。时代的局限和西方教育背景导致了作家对中国的疑虑和认知空白。西方出版界的审查制度和美国读者接受的意识形态规训同样造成了黄哲伦模糊的伦理立场。他只能进行有限的反叛，小心翼翼地把握被接受和放弃的平衡。性别伦理的突出也削弱了种族伦理的表现，读者的关注点更容易被引导到西方男性气质的问题，而忽视对种族问题的深入探究。宋丽玲的阴性形象也影响种族伦理的表达效果。宋丽玲主动操演“多愁善感”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强化了刻板东方形象。因此，《蝴蝶君》受到某些亚裔评论家的抨击，认为黄哲伦并未突破东方主义的再现策略。

《蝴蝶君》还再次采用了失语的东方这一叙事结构。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认为底层无法表述自己。故事层的人物关系隐喻了话语层的权力关系。伽利马是叙事的聚焦者和发声者，更贴近观众的认知立场，容易获得观众的同情。因为受述者的失语，宋丽玲没有话语层的主导性，真实心理缺场，致使其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再次造成了作者伦理立场的模糊。话语形式和叙事模式的选取反映作者的叙事主旨，进而影响读者的接受态度。伽利马叙事者的身份将宋丽玲挤压至失语状态，因此处于冲突中心的华人形象再次显得含混不清。有关宋丽玲的关键信息成为无从知晓的叙事谜团。对事件的解读需要返回到伦理现场。受益于中美关系解冻和后民权时代，作家实现了种族现身，但历史裹挟的个体只能进行有限的选择。人物失语的深层原因是政治的失语。《蝴蝶君》的原型时佩璞事件糅合了性别、政治、伦理、文化等因素，受冷战背景的影响，产生了轰动效应，然而这一事件疑点重重。事实上，中西方戏剧中都有男性扮演女性的传统。伽利马长期在北京生活，对京剧中的男旦传统不可能一无所知。另外，中国当局始终未确认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中西方媒体对同一事件的差异报导表明中西伦理立场截然对立，中方的话语缺失意味着真相的难以触及和错综复杂。

华裔美国文学是中西交往的产物，也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相关研究可以揭示中西话语的对抗和制衡。《蝴蝶君》等族裔文本时常引起较大的伦理争议，大多是因为文本生产的伦理语境的规训、作者复杂的伦理身份、文本的多维伦理内涵、读者迥异的伦理立场。黄哲伦彰显了华裔创作的可见性。宋丽玲这一人物形象打破原本美国主流文学中华人男性形象的失真和符号化特征，将华人男性的性别、族裔和文化身份的问题前景化，驳斥了

西方话语的性别伦理、种族伦理和叙事伦理。作家和读者承担了各自的伦理责任。中国读者和学者应该警惕华裔作家复杂的伦理身份，挖掘华裔作品的伦理价值，有意识地培养正面和正确地解读和宣传中国形象的使命感，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保持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华裔作家应该正视自己的中国身份，也应该认识到：隐喻黄祸的傅满洲，代表模范少数族裔的陈查理和冷战形象的宋丽玲，都已经沉入历史。塑造符合当下伦理语境的真实的中国形象，既是华裔作家的伦理责任，也是当下读者的伦理需求。

Works Cited

- Bhabha, Homi K. *The Other Question: Differ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 . *Undoing Gender*.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 Campbell, Karen. "In the Realm of the Voices." *American Theatre* 1 (2003): 103-06.
- Chin, Frank.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Jeffery Paul Chan, Frank Chin, Lawson Fusao Inada and Shawn Wong. NY: Meridian, 1991. i-xcii.
- Cooperman, Robert.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Henry Hwang." *Staging Difference: Cultural Pluralism in American Theatre & Drama* 11 (1993): 365-373.
- Connell, Robert.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 Doane, Mary Ann. *Femmes Fatales*.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 董晓烨: "美国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和种族操演", 《北方论丛》3 (2017): 61-67。
- [Dong Xiaoye. "Gender and Racial Performativity of Chinese American Male Images." *The Northern Forum* 3 (2017): 61-67.]
- Forster, E.M. *Aspects of the Novel*.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3.
- Hwang, David Henry. *M. Butterfly*. New York: Penguin, 1988.
- 黄哲伦: 《蝴蝶君》, 张生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
- [Hwang, David Henry. *M. Butterfly*, translated by Zhang She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10.]
- Oliver, Edith. "Poor Butterfly." *The New Yorker* 7 (1988): 72.
- Phelan, James.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9.
- Roosevelt, Theodore.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NY: Scribner, 1926.
- Shin, Andrew. "Projected Bodies in David Henry Hwang's *M. Butterfly* and *Golden Gate*." *MELUS* 1 (2002): 178-97.
- Wu, William F. *The Yellow Peril: Chinese-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82.